



■ 主管: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学生媒体总社  
■ 投稿邮箱:zwxsj2007@163.com

■ 刊头题字:李文海教授  
■ 出版日期:2012年11月4日

■ 网站: <http://www.zwxsj.com.cn>  
■ 总第 101 期

■ 主编:涂好运 朱敏 虞丹瑜  
■ 社长:张琦琦 刘寒青 姚思佳

## 第三届世界汉学大会在中国人民大学隆重举行

2012年11月3日,由中国人民大学与国家汉办共同举办的“第三届世界汉学大会”在中国人民大学明德堂隆重召开。这是继2007年与2009年两届世界汉学大会之后的又一次全球范围的汉学研究盛会,共有一百多位来自海内外的专家学者参加。本届大会的主题为“汉学与中国世界”,共设有“‘新汉学’的趋势与展望”、“中国道路与世界经济秩序”、“文化差异与国际政治的走向”、“传统伦理与人类的未来”及“中国典籍的翻译及其当代意义:对译及其差异”五个议题,意在梳理传统汉学与中国研究的承续,推进中国主流学术与海外汉学的沟通,探讨世界对中国的阐释以及“中国道路”对世界的意义,通过语言与思想、汉学与国学、“新汉学”与世界大势的相生互动,使“文明对话”与“文化交流”的主题得到进一步深化。同时,大会还设有“汉学的未来与‘孔子新汉学计划’”一个大会专场,及“中外文化大奖获奖者论坛”、“孔子学院与世界多元文化交流”两个专题论坛,对大会议题进行更为开放和更加具体的延伸。

在第三届世界汉学大会的开幕式上,第九届、第十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



2012年11月3日,由中国人民大学与国家汉办共同举办的“第三届世界汉学大会”在中国人民大学明德堂隆重召开。本届大会为期三天,以“汉学与中国世界”为主题。图为开幕式及大会主题发言与会者在明德堂合影。

网络新闻社/摄

许嘉璐、教育部副部长郝平、中国人民大学校长陈雨露等出席会议并讲话。郝平在致辞中对这一汉学界盛会的再次召开表示热烈的祝贺。他说,当今世界是一个多元对话的世界,汉学有贵

任突破学科的界限,为“当代中国”和“当今世界”做出更多贡献,更有效地推动文明间对话与和谐世界的建设。陈雨露对于海内外学者的莅临表示了由衷的感谢和热烈的欢迎。他表示,今

天世界汉学大会正在产生愈发广泛的号召力和影响力,成为中外学者沟通和交流的重要论坛,同时,仰仗各界贤达的积极参与和鼎力支持,它也标志着当今汉学的发展和走向。随后,许嘉

璐围绕“汉学与中国世界”的时代性、开放性和对话性内涵发表了大会主旨演讲。

据悉,在为期三天的大会日程中,国内著名学者汤一介、乐黛云、方立天

等受邀点评,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高级客座研究员马丁·雅克、美国贝勒大学资深教授谢大卫、美国哈佛大学杜维明教授、香港城市大学讲座教授张隆溪等知名海外学者也将在分组会议上发表论文,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杨念群、南京大学教授程章灿等大陆学者将就相关议题发表自己的见解。

迄今为止,世界汉学大会已成功举办了三届。2007年3月第一届世界汉学大会的主题为“文明对话与和谐世界”,2009年10月第二届世界汉学大会的主题为“汉学与跨文化交流”。本届世界汉学大会与前两届相比,论题的涵盖面更广,不仅包含汉学与传统的内容,更扩展至政治经济等相关领域。与会专家学者纷纷表示,世界汉学大会不仅是具有广泛国际学术影响力的学术品牌,同时也是沟通中国主流学术与海外汉学研究的重要平台。相信本届大会必定会对汉学的未来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尤其是本届大会所提出的“大汉学”与“新汉学”的构想和实践,更将进一步推动世界汉学研究的发展和振兴。

## 教育部副部长郝平开幕式致辞



网络新闻社/摄

尊敬的许嘉璐副委员长、国家汉办许琳主任,尊敬的各位来宾,各位老师、同学们,大家上午好!很高兴来到中国人民大学参加第三届世界汉学大会。

世界汉学大会是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学术品牌,也是沟通中国主流学术和海外汉学研究的重要论坛。2007年的第一届世界汉学大会和2009年的第二届汉学大会分别以“文明对话与和谐世界”和“汉学与跨文化交流”为主题,通过汉学研究及中国学界对海外汉学的回应,共同挖掘中国传统文化对构建和谐世界的价值,倡导中外学者跨越历史传统、族群社会的差异,为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对话、理解与合作发挥了重要作用,取得了丰硕成果,也为汉学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当今世界”是一个多元对话的世界,汉学有责任突破学科的界限,为“当代中国”和“当今世界”做出更多的贡献。今天,各位专家学者再次聚首中国人民大学,在前两届大会的成果基础上,提出了“汉学与中国世界”这个主题,使本届大会将

不仅在文明和文化的层面上讨论汉学的意义和责任,还将传统汉学、当代中国研究、国学研究、海外孔子学院的实践等等一系列相关的、重大的现实问题贯通起来,现实抱负更加明确,这个主题的讨论一定会有助于引导和建立一个更加适应时代、更具对话能力和更有责任意识的“新汉学”。

的确,汉学作为一个独特的学术领域,已经日益成为深化中国与世界文化交流和理解的重要窗口。截至目前,我国在108个国家和地区开设398所孔子学院和526个孔子课堂。当今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社会和谐安定,对外开放不断深化,全世界也越来越重视与中国的交往。汉学研究取得新的成果,孔子学院的进一步发展一定能够更好地促进中国与世界在政治、经济、教育、科技、文化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更有效地推动文明间对话与和谐世界的建设。

最后,我代表教育部对第三届世界汉学大会的举办表示衷心的祝贺,祝汉学研究取得更多、更好的成绩。谢谢大家!

## 中国人民大学校长陈雨露开幕式致辞

尊敬的许嘉璐副委员长,尊敬的郝平副部长、许琳主任,尊敬的各位专家学者、女士们先生们,在第三届世界汉学大会开幕之际,请允许我代表中国人民大学热烈欢迎、衷心感谢各位的莅临。“欢迎”的“迎”字,原意是从相反的方向而来,即相逢、相遇。然而相逢实属不易:大约两千年前,汉朝甘英奉命出使罗马帝国,行走数千里抵达波斯湾,却因前方海路凶险的传闻中途折返。近代思想家梁启超为此发出无穷之憾,痛惜东西方错过了提前相遇的机会。今天的我们,比古人更幸运。本届世界汉学大会已经是2007年、2009年两届盛会之后的第三次重聚。回首这五年,我们欣喜地看到,世界汉学大会正在产生愈发广泛的号召力和影响力,成为中外学者沟通和交流的重要论坛。同时,仰仗各界贤达的

积极参与和鼎力支持,它也标志着当今汉学的发展和走向。

如果说第一届世界汉学大会是以“文明对话与和谐世界”为主线,演绎“和而不同”与“对立产生和谐”的先哲教诲,第二届世界汉学大会是以“汉学与跨文化交流”为焦点,阐扬“同归而殊途”、“此路亦彼路”的古训命题,那么今天的论题“汉学与中国世界”,同样是希望“察古”而立于此,“视往”以知来者。各位可以从主席台两侧的展板上看到《周易》所谓的“与时偕行”和柏拉图主张的“因势而通”,都启发着一种“旧邦新命”、“与古为新”的精神机制。其中对“时”和“势”的参与和把握,不仅是人类自古以来的共同期盼,也仍是今人必须要面对的根本问题。近代以来,中国曾在“传统”与“西化”之间长期摸索,不断寻求与世界平

等对话的方式,而当今世界政治、经济和文化格局都正在发生更为深刻的变化,这样的时代机遇和世界大势必将使中国道路具有汉学的视野,必将使传统的汉学进一步融通古今学术、跨越学科界限,含纳现实关怀,迎接当今世界和当代中国的多重挑战。由此呼之欲出的应当是一种更加适应时代、更具对话能力的“新汉学”和“大汉学”。

世界汉学大会倡导中外同仁跨越历史传统、价值观念、族群身份的隔阂,由对话而增进理解,因理解而尊重差异,从差异而达成和谐。当今世界纷争不断、危机愈烈,然天道存焉、人心向善,世界汉学大会的根本理念正得到日趋广泛的认同。在接下来的三天时间里,大会将以“汉学与中国世界”为题,梳理传统汉学与中国研究的承续,推进中国主流学术与海外汉学的沟通,探讨世界对中国的阐释以及“中国道路”对世界的意义,并结合国家汉

办和孔子学院总部的“孔子新汉学计划”,通过语言与思想、汉学与国学、“新汉学”与世界大势的相生互动,使“文明对话”与“文化交流”的主题得到进一步深化。我们期待着各位代表的精彩发言,期待各位把真知灼见留在中国,留在人大。

祝愿大会圆满成功,祝愿大家身体健康,谢谢!



网络新闻社/摄

2012年11月3日下午,本届大会的五组分组会议同时举行,主题依次为“‘新汉学’的趋势与展望”、“中国道路与世界经济秩序”、“文化差异与国际政治走向”、“传统伦理与人类的未来”和“中国典籍的翻译及其当代意义”。大批来自国内外的学者们共聚一堂,从不同角度阐述自己的学术见解,呈现出“百家争鸣”的学术氛围。

在以“‘新汉学’的趋势与展望”为论题的第一分会场中,台湾东华大学何重谊教授围绕“新汉学”的概念,强调只有不同文化相互交融才能产生新能量。海德堡大学梅嘉乐教授以一个外国学者的视角关于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进行反思,并表达了对中华文化传播的期望。随后,波恩大学顾彬教授阐述了西方对中国的影响和西方概念的变化。北京外国语大学张西平教授则强调汉学有自己的传统和脉络,认为对于汉学应该从多文化多角度予以理解。在第二分会场中,耶鲁大学司马懿教授针对民国时期神学对今天的意义做了精彩的解读,强调基督神学必须与当今中国文化相结合。北京大学钟志邦教授则以“汉学与汉语神学”为主题,对各个宗教的发展状况作了详尽的解释并殷切希望汉语神学能具有更大的包容性。杜伦大学司马麟教授对于1700年到2000年英国报刊中孔子形象的演变做出了细致的解说,将孔子作为中国的文化标志与苏格拉底等古希腊哲人做比较,分析东西方文化的差异。

在以“文化差异与国际政治走向”为主题的分组会议中,韩国成均馆大学李聆昊教授讲述了朱熹对传统儒学的发展,并由此引申至锻炼自身的重要性及方法。在此之后,法

## 世界汉学大会分组会议简讯

国现代中国研究中心德保仁教授强调了汉学的使命,即将“中国世界”的意义传递到非中国的世界中去,并提出进行中国关系互联网建设的主张。在以“传统伦理与人类未来”为主题的分组会议中,来自坎特伯雷大学的伍晓明教授提出了“文化交流的条件”和“中国文化的身份认同”等问题。我校梁海教授以“‘亲亲相隐’与‘隐而论之’”为主题,表达了自己对学术界争论的看法。澳门利民学社赵仪文教授发表了以“新型中国研究与价值追寻”为主题的讲话。他通过阐述蔡元培、胡适、冯友兰的思想以及“中体西用”等观念进行了发人深省的讲述。在以“中国典籍的翻译及其当代意义”为主题的会议中,悉尼大学杜妮妮教授从现代汉学的快速发展谈到了汉学的普适性,强调了汉学家们的作用。香港浸会大学费乐仁教授将关注点放到神学典籍翻译上,并强调学者要注重典籍的多元化理解。来自波恩天主教学术交流中心的汉克杰教授提出了对《易经》系统整体性的研究方法,这对我国研究《易经》具有较为深刻的意义。

这五组会议也将在周日上午再次举行,教授们也会继续对同一主题进行更为深入和全面的探讨,相信同样会产生新的火花,让我们拭目以待!



# 许嘉璐： 汉学的“三个面向”与人类新秩序

2012年11月3日上午9点，第三届世界汉学大会开幕式在中国人民大学如论讲堂拉开帷幕，第九届、十届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许嘉璐先生在会上进行了主旨演讲。

首先，许嘉璐先生对与会的领导、嘉宾、老师和同学表示热烈的欢迎，并为自己能连续参加三届世界汉学大会感到非常荣幸。基于世界汉学大会越办越好的现状，许嘉璐先生热切地说道：“近年来，在中国国内，汉学已经取得了飞快的进步。研究规模的扩大、研究经费的增长、研究课题的广泛、研究成果的深入，都是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不可比拟的。这是人所共见的事实，这是中国文化的苏醒，更是努力在学理上把古老传统与当前现实结合起来探索的继续。与此同时，在世界范围内，一股反思我们的时代、回顾人类祖先曾经思想共进的潮流一直波澜不惊地延续着，这不是一个或几个国家学术界的事情，在我看来，这是人类一次新觉醒的开始。”

接着，许嘉璐先生提到他所说的“新觉醒”是相对于雅斯贝尔斯的“轴心时代”而言的，并强调“轴心时代”是人类一次极其重要的觉醒。“从那时起，人类就像从茫茫的黑夜中看到了曙光，有了心灵的方向。在此后的长途跋涉中，虽然困苦艰难，时时出现邪恶、昏聩、暴虐和兽性，前进中又有后退、崛起后又出现了沉沦。但是，良知、理性和正义一直在起着历史平衡器的作用，并引导着人类不断探索前进的方向和道路”。然而，聚焦当今世界，人类正面临一场空前的危机：世界动荡、环境恶化、资源枯竭等，人类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的探索都无法在实质上改变什么。针对这一点，



网络新闻社/摄

许先生认为原因是“风行全球的工具理性、技术至上、金钱崇拜、中国教育体系、文化产品、宗教宣传，已经占据五大洲的每个角落。人们思考政治、经济、社会、家庭的一切问题，不由自主地把金钱、技术放在第一位，甚至放在核心的位置，放弃或者不懂得应该把自然和人作为思考的出发点和归宿。当下，大自然和人类的种种矛盾与危机，归根结底是人的主观造成的。”批判现代生活，用审视的眼光看待人类与宇宙的关系，他继续说道，“技术的高速发展，人的手脚无限加长，眼耳越来越敏锐，这就强化了人们对自己应对客观世界能力的过高估计。人类自以为是宇宙的中心，无论是在自然面前，还是在他人面前，变得越来越狂妄，越来越霸道，其实也越来越成为自己所创造的种种物质的与精神的、实在的与虚拟的对象的奴隶。”

当今的世界已经远离“轴心时代”各个圣贤的教诲与期望，反而越来越走向自我毁灭。许先生认为，现在是时候让人类学会放下身段认识自己的微不足道，谦恭地寻求安宁，

和善地生存下去并且共同发展，以便让我们的子孙获得真正的幸福之道。在如何对待自然与他人的问题上，他提出了中国传统三家的视角：孔子以“仁”为核心的伦理观、道家以“道”为本体的宇宙观、佛教“缘起性空”的本体观。这三家其实是从不同角度告诉我们应该以敬畏、感恩的心态，以符合自然和社会存在与发展规律的思路对待地球，而这在各种宗教和信仰中也是有类似理念的。

基于传统文化的魅力和普世价值，许先生强调在现今世界，所有的文明都应该回归源头，重新品味、努力追及先代哲人圣贤的智慧，这也是当代哲学特别关注经典诠释学的重要原因。接着，他又针对汉学的发展提出“三个面向”：面向当下、面向世界、面向未来。

汉学“面向当下”是有其必然原因的，中国的学术传统注重实用，关注现实，其品格之一就在于面对当下、知行合一。现代化的发展对学术传统和蕴含在人民生活中的传统冲击越来越大，这使得今日的中国百姓亟需汉学的精华，亟需学界的关怀。

他们既需要学界针对现实问题，基于中国文化传统同时吸收其他文化营养，提出解决方案和方法；也需要学界通过各种媒介深入社区，进入中小学，向人们——特别是向青少年——贡献自己的知识和见解。他强调，从学术发展的角度看，立足今日之实际，以今日之视野，审视、解读、讲述传统。

汉学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这决定了汉学要面向世界。世界需要汉学，中国文化的诸元素可以为人类构建未来伦理提供参考；同样，汉学需要世界，只在固有的圈子里解读和反思，汉学就难于攀上一个高峰，难以为中国和世

界贡献智慧。为此，汉学的发展离不开与世界汉学界的交流，要“走出去”，也要“请进来”。用许先生的话说：“走出去”，最好有相当数量的学者，特别是年轻学者，能够在外面住下去；同样，“请进来”，最好能够有一批外国的学者在中国住下来。中国的和外国的学者都需要在对方的生活和文化氛围里获得直接的体验，把握对方思维特点及其形成的传统与现实因素。”基于此，孔子学院提出了“新汉学计划”，并与中国不少高校协同创新，为扩大并深化这一领域的中外交流与合作提供了很好的资源和平台。

提到汉学“面向世界”，许嘉璐先生提出应向世界各国国民介绍中华文化，以期摆脱中华文化在文化他者眼中浓重的神秘色彩。同时，汉学“面向未来”与“面向世界”是紧密联系的。未来的世界将会是不同文明和平共处、寻找共同价值且各自保持个性发展的世界。对于二者的关系，许先生说：“没有世界的眼光和视角就没有未来，不‘面向未来’也就不可能‘面向世界’”。在汉学“面向未来”这

## 陈雨露校长 晚宴致辞

尊敬的各位学者、各位新老朋友：  
大家晚上好！

因为大家都非常的辛苦，所以今天的欢迎晚宴仅有的一个讲话也会非常简短。第一句话，借第三届世界汉学大会成功开幕之际，中国人民大学今天晚上略备薄酒，欢迎到来的各位朋友！第二句话，中国的历史学家说“他人是自己的一面镜子”，一位西方的哲学家也说“他者是通向自我的最短的路径”。这让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孔子的那句名言“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也让我们深切地感受到欢乐总是跟相逢相遇有关，或者是跟期待再次相逢相遇有关。第三句话，这次第三届世界汉学大会，希望各位汉学家、各位朋友能够过得愉快。同时，我们希望第四届、第五届会长久久。我们在座的各位朋友，每一届都能光临中国人民大学。让我们的朋友越来越多，让我们的欢乐越来越多！

在此，我提议共同举杯，为了我们这一次的相逢和下一轮的相逢，为了本次世界汉学大会圆满成功，Cheers!

点上，师承是有着极大作用的。虽然师承可能导致宗派对立、固步自封等问题，但是无可否认，师承对人才的延续具有积极意义，更对文化的传承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通古今之变，究天人之际”这句话，不仅是中国历代学人共同的终生奋斗目标，更应该成为汉学“面向未来”的圭臬。相应的，在研究领域上，微观与宏观、考证与史论都不可或缺，也就是说，汉学要“面向未来”就要设想未来的中国和世界会是个什么样子，从而思考从现在起我们为了那一天应该做些什么。

回归到最开始提及的反思、觉醒和人类伦理，许嘉璐先生指出，“汉学面向未来，积极参与世界范围内不同信仰间的对话，寻找共融和义理自在的话下。人类的不同信仰是不同文明的脊梁和灵魂，几个主要文明影响了

几千年来世界的格局和走势。面向世界和未来，就不能不想到不同信仰的未来。”对比当今社会，显然“从‘轴心时代’起，带领着人们走到现在的种种文明和信仰，现在面临着共同的挑战和压力”，许嘉璐先生强调，唯一的出路也许就是各种文明在各自反省的基础上携手为构建人类的共同伦理而努力。

对于汉学的“三个面向”，许嘉璐先生提到，我们在很多方面没有做好准备，突出体现在汉语的世界眼光和人才培养上。因而不同文明和信仰之间的对话、互学和交融是最佳选择。汉学的发展任重而道远。当然，汉学的发展也离不开汉学家们的齐心协力。最后，许嘉璐先生对世界汉学大会这个意义重大的平台也给予了厚望和衷心的祝愿。

(本报记者：吴林华)

## 献礼第三届世界汉学大会

# “孔子新汉学计划”蓄势待发

11月3日下午2点，“汉学的未来与‘孔子新汉学计划’”专场会议在中国人民大学国图报告厅举行。大会对于国家汉办新启动的“孔子新汉学计划”研究项目进行了深入探讨。中国国家汉办主任、孔子学院总部总干事许琳和原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孔子学院总部高级顾问纪宝成发表了主题演讲。中国人民大学校长陈雨露和来自不同国家的汉学家们应邀出席了本次会议。大会由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杨慧林主持。

“时隔三年，世界汉学大会再次在中国人民大学隆重举行，来自海内外的专家学者、新老朋友们齐聚一堂，共商繁荣发展汉学大计。”许琳主任首先代表国家汉办和孔子学院总部对第三届世界汉学大会的召开表示了祝贺，并对出席本次会议的汉学家们表达了问候。

随后，许琳主任介绍了孔子学院的发展情况。“目前世界各地的孔子学院已经有398所，526个孔子课堂，去年开设了各类的汉语课程24000多个班次，注册学员超过50万人，举办各种文化活动13000多场，受到了各国人民的热烈欢迎。”另外，许琳主

任对中国人民大学为汉学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表达了感谢。

同时，许琳主任对“孔子新汉学计划”也进行了细致介绍。该计划致力于通过来华学习、中外合作培养等方式，支持各国人文社科领域优秀青年学者的学术研究，培养新一代青年汉学家和中国问题研究专家，进而推动国际汉学、中国学教育及研究的发展和繁荣，为增进中国与各国的友好关系做出贡献。目前“孔子新汉学计划”已经确定了6个活动项目：中外合作培养博士、来华攻读博士学位、“理解中国”访问学者、青年领袖、国际会议和出版资助。“对于前两个项目来说，中方高校会提供很丰富的学术资源。目前进入该计划的14所中方高校，都是代表着中国在人文社科领域最高学术水平的学校。同时，国家汉办也会尽可能地给‘新汉学计划’的实施给予强大的资金支持。”

随后，孔子学院总部高级顾问、原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对“孔子新汉学计划”的战略意义及具体措施进行了补充说明。他指出，世界各国人民深入了解中国的愿望日益强烈。国外学者对“孔子新汉学计划”表示

充分肯定，认为它对未来汉学家的成长、国际新汉学的繁荣和发展能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另外，在经济全球



化的大背景之下，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经贸往来十分频繁，文化差异问题在这个过程中十分突出。国家汉办推出的“孔子新汉学计划”可以呼吁更多汉学家和中国问题专家成为中

西方文化沟通交流的桥梁，在文化上实现心灵的沟通，从而促进经贸往来的持续健康发展。

学位制度与其他国家有所不同，各国研究领域、研究重点也有所差异，纪宝成还介绍了国家汉办所采取的一些特殊措施。“国家汉办公布了100个参考性课题，对各国学者在课题选择方面可以起到启发性作用。另外，中国的大学将成立跨学科导师组制度，对于每一名来华攻读博士学位的学生都配有导师组，以适应国外学者的跨学科研究，进行更全面的人才培养。”

在谈及“孔子新汉学计划”的未来发展时，纪宝成表示，包括中国人民大学在内的国内各大高校已经为“新汉学计划”的实施进行了长期充分的准备。“虽然‘新汉学计划’还处于起始阶段，但我相信‘新汉学计划’的未来定将是丰富多彩的，‘新汉学计划’也必将在未来的实践中不断丰富内涵、提升水平。”

与会学者对于“新汉学计划”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并提出了宝贵的建议。包括英国伦敦国王学院的姚新中教授、香港城市大学高级研究员杨富雷教授在内的多数学者都提出“新汉学计划”在丰富汉学内涵的同时，也不能忽视对传统汉学的研究，要以汉

学的学术性为本，而不能纯粹强调其作用性。姚教授指出：“现实的东西如果没有历史、文学、哲学的支持，其生命是十分短暂的。一个人如果不能对中国的历史、哲学有一定的了解，他便不可能了解中国经济、政治和中国当代的国际政治。”

“总之，我想用‘孔子新汉学计划’给我们第三届世界汉学大会献礼。”许琳主任最后表示，“我们对于‘孔子新汉学计划’注入了极大的热情，因为我们充分认识到孔子学院的可持续发展、孔子学院在当地大学的真正融入，都依仗着其高水平学术事业的成型。我们希望通过这个项目，凝聚各国汉学家的力量，为各国汉学研究提供服务与支持，壮大汉学家队伍，扩大汉学的影响力，借此以反哺孔子学院自身的发展，使它真正成为世界多元文化百花园里亮丽的花朵，也使东西方文化真正实现交流、交融、交锋。”

(本报记者：刘启民 吴静怡)



# 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明的契合

袁满芳

2012年11月3日10点整,第三届世界汉学大会主题发言第一场于明德堂按时举行。本场发言由海德堡大学的梅嘉乐教授主持,中国人民大学杨慧林副校长特地借此机会表达了对于梅嘉乐等一大批中青年学者的欢迎和期待。随后,梅嘉乐教授表达了初到人大人的荣幸之情,并介绍本场发言的三位嘉宾:美国贝勒大学的谢大卫教授、美国哈佛大学的杜维明教授和北京大学的汤一介教授。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这三位著名的汉学家以睿智而严谨的治学风范和独特而深刻的演讲角度为本届汉学大会吹响了号角。

第一位在大会上作出发言的是谢大卫教授,他主要研究中世纪文化和圣经文学。会上他做了主题为“关心穷人:中国古代智慧及其在《圣经》中的对应之处”的演讲。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智慧的文献,即便跨越两千多年还是与当今世界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他提到中国和美国的贫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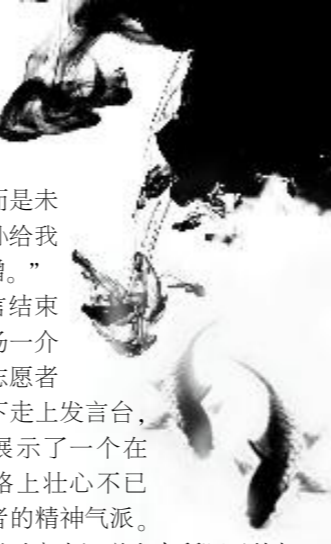
差距问题,并提出“什么是一个国家的财富”和“什么是一个国家的健康”的命题。为此,谢大卫教授从柏拉图和亚当·斯密的著述出发,联系其与《圣经》的奇妙联系,以经济学、伦理学和哲学的角度讨论“平等”的命题,随后他又以“精神上的健康”来回应“什么是一个国家的健康”的问题。并以中国传统为参照,认为《诗经》中“关心穷人、关心寡妇、关心孤儿”的思想,《论语》和《大学》中论述的“利己”和“公益”关系和“义”先于“利”的思想,以及《礼记》里对“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提倡,都是“仁”的表现。同时,谢大卫教授以《圣经》中的故事告诫我们,应该从“道德”和“智慧”的角度来解读贫富问题,而不是具体的意识形态。他认为,《圣经》中就有照顾穷人的原则,其中很多言论和观点都与儒家非常相似,并且相互补充。这些都是关系到一个国家健康的问题,而不仅仅是个人财富问题。

第二位带来精彩发言的是杜维明教授,其主题为“‘龙’的象征:中华世界的透视”。杜维明教授充分肯定了谢大卫教授提倡的道德智慧和提供的世界视野,并在此基础上对中国古代“龙”的象征的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他提出当下中国发展上的障碍需要被打破,在此文化背景下引出精神激励的巨大作用。谢大卫教授把儒家人文主义和世俗人文主义进行对比,指出儒家是一种精神性的人文传统,超越世俗人文却又开放性地存在于人类经验之中。而“龙的象征”分别是人类学和宗教学描述了这种复杂的关系。杜维明教授还指出中国文化诸多特性:一是“仁”,带有人为自身而崛起的独特性;二是包容性,比如中国文化中道家、儒家、佛家的和平共存,还包括与基督教和穆斯林传统的交融,以及近代向西方学习的意识;三是对话的文明,其主要强调的是和谐、尊重和互相学习。在此基础上,教授认为,龙的象征在人文、在“仁”的理解得到最好的体现,是对人本身的理解,也包括灵魂、国家、人类社会甚至生命经验及其整个宇宙进程的理解。在发言的最后,杜维明教授引用一句话来为儒家做

一个注释:“地球并非祖先给我们的馈赠,而是未来的子孙给我们的馈赠。”

发言结束之后,汤一介教授在志愿者的搀扶下走上发言台,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在汉学道路上壮心不已的老学者的精神气派。在表达了对本次汉学大会所昭示的气概和精神的赞扬之后,他对前两位教授的发言做出了精确的点评。对于谢大卫教授的发言,汤一介教授认为其体现了西方普遍认为的“平等说”,即“人都是上帝的儿子,都是平等的”。在这种背景下,“关心穷人”不仅是人人应尽的义务,也很具有现实意义。汤教授特别指出,中国的传统尤其儒家传统不仅具有“亲亲”的根本理念,更注重家庭之外“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也是具有普遍意义的。因此,西方的平等传统与中国“推己及人”的传统是相呼应的。对于杜维明教授的发言,汤一介教授认为其充满启发性。关于“龙”的象征,汤教授认为,《易经》就蕴含了如何在人类社会达到“龙”的境界的线索,而关于具有“龙”的精神的人在现实中应该怎么样,汤一介教授提到了学习性、包容性和创造性。中国人文精神倡导我们学习历史文化传统以及全世界人类文明的智慧,而在儒道中也传递了在发挥自身精神的基础上“道并行而不悖”和“海纳百川”的精神,从五行、先秦孔子到宋儒,他们也是代代传承和创造的。

在本场主题发言的最后,汤教授以豪言作结:“中国正在吸收西方文化以及其它各民族文化,将会出现一个新的时代!”本场会议也在如雷的掌声中拉下帷幕。



# 家 内外间 误解与沟通

汤 欢

本场会议由美国耶鲁大学副教授司马懿主持,首先发言的是前中美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柯白。近三十年来,他一直在从事有关中美关系桥梁的工作,他今天演讲的题目是《中美贸易全国委员会四十年工作反思》。

柯白认为,文化间的交流首先是内部和外部的对话。他举了两个例子来阐释这个问题。首先是日本政治家对美国工人进行言论攻击,说明日本国内的对话存在不一致;其次是关于一本向美国儿童介绍中国文化的书,其中的语气和口吻并不恰当,会直接导致美国人的误解,这又是外部对话的问题,因此我们要注意如何描述自己,同时要注意世界如何影响我们。

他还指出,我们每个人对这个世界的看法,是由我们的家庭背景,从小接受的教育和我们的社会地位等因素所决定的。接着他以自己给温总理做翻译为例,提出了有效的交流和恰当的社会行为要求之间的关系。当时总理讲话结束后,翻译将问题翻译错了,是不礼貌地打断总理的回答还是将错就错?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所以有效的沟通有时是与礼仪是不兼容的,但有效的沟通要比社交礼仪更重要。

最后,柯白还谈到了对美国的宪法理解的问题,并由此引申到对中国文化典籍的解读,认为文字至上的原则是不可取的。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如今中国崛起了,是否会设计新的规则让世界来遵守?中国是否会把自己的传统强加给其他人?最重要的问题是,究竟谁会成为制定规则的人?这让这个世界充满了不确定性。

接着,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美国研究中心主任时殷弘教授发言:《普遍主义、特殊主义和民族主义:在当代世界的当代中国涵义》。首先,他谈到了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是相对立的世界观和思想方式。普遍主义,包括宗教、哲学和社会思想方面的普遍原则。而要达到较自觉、较系统的特殊主义,就须挣脱非常长久的对“普遍最高存在”的迷信,进而生成历史主义,强调事务个性、新鲜经验和创新实践。但是这样容易流于相对主义,最终也会让一切处于一种价值混乱。在政治和文化实践中,双方共同的相对主义立场虽然或许有助于互不干涉、平安共处,但它同时消减了真正深入的沟通和追求共同利益的可能性。

其次他谈到特殊主义与现当代中国思想史上的根本创新,通过毛泽东领导的革命和邓小平领导的改革和发展,向全世界有力地昭示了西式现代化决非现代化的唯一形态。各国人民的未来主要取决于各国人民根据本国具体形势的自主实践,谁也不能代替或主导各国人民自己确定本国的主要问题

和解决问题的道路,谁也不能声称适合自己的就必定适合别国人民和全世界。毛泽东在坚决抵制共产国际的革命普遍主义的同时,也拒绝中国传统的儒家世界观及其“方法论”的礼教普遍主义,他们的根本哲理与儒家的思想方法确有天壤之别。中国走自己的路,而且广而言之,各国人民也要走自己的路,这可以说是中国思想的一个伟大革命。

再次,他认为真正的强国必不可少的是“精神独立”。用兰克的政治哲学话语来说,每个民族社会都必须被视为一个价值体,只有依据其各自的内在观念、内在状态和环境才能被理解,而不是依据一个实际上虚空的普世价值标准来判断。

最后,他谈到当代中国的民族主义。就其政府主持的形态而言,当代中国民族主义是“讲究实际的民族主义”,主要特征在于下列特性的结合:前瞻、镇定、耐心和更尊重中国特性。在当今中国,还有一类非政府的民族主义,它包含有的对外部世界简单粗鲁的态度,还有对本国政府软弱政策的常有指责。如何合理地引导公众及其舆论,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文化间的差异会直接影响国际政治和中国未来的前途,直接作用于中国人今后的自主的实践和奋斗。

最后,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黄仁伟做出总结,他认为柯白全面地总结了与外部世界的沟通过程中遇到的问题。首先是内部和外部对话的问题形成的障碍,其次是个人的专业、身份、角度的不同也会带来交流的误解和冲突,最后是翻译和媒体的误导,这也会导致错误信息的传播。此外,他提到了洋为中用、规则制定与遵守的问题。这些沟通的障碍是国家间矛盾产生的根源,而只有了解其原始的起点,才能进行有效的沟通。

黄仁伟在总结时殷弘教授的发言时提出,普遍主义和特殊主义正是中国和外部世界的关系。普遍主义和相对主义之间会发生转化,如今中国模式对西方国家来说是一种特殊主义,但是未来会不会形成霸权主义的普遍主义?这是西方国家一直怀疑和警惕的问题。然而关键问题在于未来的世界由谁来制定规则。他认为这个规则显然不应该由某一个超级大国来制定,而应该由世界各国共同制定。



网络新闻社/摄

# 多元文化与相互理解

李双南

11月3日上午11点半,第三届世界汉学大会主题发言的第三场在明德堂按时举行。本场大会发言由苏黎世大学高级讲师韦宁担任主持,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高级研究员马丁·雅克和香港城市大学张隆溪教授先后发言,最后由中国中国人民大学温铁军教授进行点评和总结。

首先,马丁·雅克教授发表了主题为“理解中国,理解世界”的演讲。他强调了二百多年来西方垄断世界话语权的历史背景,即认为“只有理解西方,才能理解世界”。因而两个世纪来,西方思维主导世界,不断淹没其他文明的传统。时至21世纪,这个状况已有所改变,而现代化的模式也将变得多元。雅克教授特别指出:“在这个不同现代化模式互相竞争的时代,中国将会是主角。”因此,面对中国主导的发展中国家崛起的现实,西方必须以中国的方式——而不再是以根深蒂固的西方思维——来理解

中国,而理解中国的起点则是理解中国的历史文化。雅克教授在此基础上进行了一系列深入的研究,并得出以下两大结论:第一,对中国而言,最重要的是文明国家而非民族国家的身份认同。因为中国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自身构建都是以文明而非民族国家的方式构建的;第二,中国的独特性使其与西方社会迥异。中国具有一种“身在国中,心怀世界”的普世性宇宙观,而缺乏一种改变整个世界的雄心。同时,由于中国社会和政府的关系模式不同于西方,中国政府的合法性要从政府与中国文明的稳定性和延续性的操作关系中取得,因此,中国将会成为一个区别于美国的大

国。雅克教授最后总结说:要充分认清中国的不同。中国不会成为另一个版本的西方世界,而世界也会变得越来越“去西方化”及多元化,因此世界会越来越多地被中国塑造。“中国的崛起标志着西方主导权的结束和一个新世界的诞生,一个处处带有中国烙印,令生活在西方的人们感到陌生的新世界”。

张隆溪教授发言的主题是:“汉学与中国学术:迈向知识整合”。他先介绍了中国本土的学术传统,比如儒家强调证明、道家怀疑语言和知识、佛教重视“空”的概念等,都是古代中国对知识与真理的探讨。而多年以

来,汉学或西方的中国研究总是倾向于漠视中国本土学术,认为所有的理论模型和方法均来自西方,并源于一个西方所独有的哲学传统,而中国本土学术则因为理论不成熟、不切题或宣传意识形态而可能被忽略,这是尤其值得关注的。张教授认为,西方汉学家忽视中国本土的学术界的原因为有二:一是在政治上,很多学者认为中国20世纪的学术受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影响,在本质上成为一种意识形态的灌输,因而不值得研究;二是在学术传统上,出于一种西方社会学学科的傲慢心理,认为优秀的理论源于西方。因此,很多西方汉学家都是以西方为中心理解中国,

而不是用中国人的观点和体验来进行理解。然而,在全球化的当今世界,这种观点和方法已经受到了深刻的质疑。

这种“社会科学的自负”引起了张隆溪教授的强烈关注,他由此强调汉学研究的切入点和方法,即要在理解中国及其历史、社会和文化传统方面的基础上,积极整合汉学的知识与中国本土学术。当然,以中国为中心理解也并非能解决所有问题,张教授认为:“没有任何一个特定的角度能确保我们全面地理解中国,只有放弃中西二分法,让我们的身份多元化,才能达到中西学术传统的结合。”在点评环节中,温铁军教授也提

出:“理解中国,世界需要找到逻辑构成的起点,而这个起点要放在历史经验的起点之上。西方民族国家的历史很短,现在的欧洲从形式上来看甚至像中国完成大一统前的样子,这就需要在比较民族国家等概念时,把视角放在更久远的历史中考量。”





# 中国近代思想研究在日本

## 专访东京大学近藤邦康教授

吴静怡

“日本对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研究在近年来逐渐呈现多样化的趋势。如何更完整、全面地介绍中国近代思想发展进程,让日本民众,尤其是年轻人对中国近代历史有一个更为准确和客观的理解,是我们研究者的重要任务之一。”作为日本近代思想史研究领域的专家,东京大学近藤邦康教授受邀参加第三届世界汉学大会,并将在主题为“传统伦理与人类未来”的分论坛中对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发展脉络进行更为深入的阐释,探讨中国近代思想史与当今世界之间的关系,力求在多元化的世界视野下展现丰富而深厚的中国思想。

近藤邦康教授指出,日本学者对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研究工作在很早之前就开始了。他自己也在竹内好和西田几多郎两位老师的影响下开始了对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研究。早在1976年,近藤教授就和其他五位学者共同参与了旧编《原典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编撰工作,整理了从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一百多年间的主要思想家的论文,并将其翻译成日文,于1977年出版。这是日本学者对于中国近代思想史的一次较早的系统性的汇总整理,对日本的近代史思想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直到现在,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研究也还是日本学者关注的焦点之一,这无疑要归功于以近藤邦康教授为代表的一大批日本学者的学术贡献。

三十多年来,随着研究的深入,日本学者内部产生了较大的分歧,尤其是老年学者和中青年学者之间的观点差异很大。针对以上现象,近藤邦康教授解释说,老年学者偏向于革命一元论的观点,因此在进行历史研究时,十分看重革命与近代思想间的相互作用,从而在史料选择上比较单一;而当今日本中青年学者则认为当时中国历史是多元化的,支持社会多元论。

在进行历史研究之时,他们不太重视革命。在近藤邦康教授看来,中国学界的近代思想研究也发生了同样的变化,为此他还说道:“以前中国学者在研究近代思想史的时候十分强调马列主义的观点,改革开放后,中国学者的研究方法多样化了。比如说李泽厚,他在研究近代思想史方面水平是很高的,开拓了近代思想史研究的新范式。”也正是这样的一种思潮的出现,在2007年,近藤教授参与了新编《原典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编撰。通过史料取舍,日本学者们力图全面而且客观地还原中国近代思想的面貌。他们改变了旧版的革命一元论的论调,扩大了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视野。从旧编到新编,这折射出日本学界研究思潮的变化,也是日本三十多年来社会文化变化的缩影。

在谈及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对当今中国社会的借鉴时,近藤邦康教授表示,中国近代思想史内涵丰富,但他最关注的还是中国近代的“救亡”和“民主”的主题。在他看来,“救亡”和“民主”是近代中国思想史研究上两个核心的问题,具有深度挖掘的空间。当下中国已经解决了“救亡”的问题,在未来应当更加关注民主建设问题,借鉴前人留下的宝贵精神遗产,一步一步地实现自己的梦想。

最后,近藤邦康教授肯定了世界汉学大会在促进中外学者之间交流合作、共同推动学术研究进程的重要作用,并祝愿本届世界汉学大会可以取得圆满成功。



# 英国报刊中孔子形象的演变

## ——专访英国汉学家司马麟教授

汤欢

司马麟教授是英国著名汉学家,近年来主要从事中英翻译、中国政府的文化政策和孔子教育模式方面的研究。11月2日上午他抵达北京,本报记者会在前对他进行了专访。

尽管风尘仆仆,司马麟教授依旧显得神采奕奕,交谈中不时表现出英式幽默。谈起他和汉语的渊源,他感慨地表示,兴趣之外,更缘于对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的虔诚和向往。

司马麟教授提到:“最近一次来北京还是2009年举办上届汉学大会的时候。”说起上届汉学大会,他兴奋地说:“我记得那天晚上下起了大雪,我没有带太多的衣服,所以很冷。尽管如此,我却感受到了一种别样的美,尤其是大家一起踏着雪参观故宫的时候,皓月当空,很像一幅山水画。”多年来对中国文化的研究使司马麟教授具有了一种中国古代文人的情怀和审美趣味。除了那场大雪,更让他难以忘怀的是上届汉学大会中的学术交流盛况。“我觉得世界上这么多的汉学家聚在一起交流,是一件很有意义很有趣的事情,你会有很多新的收获和灵感。”他还向记者介绍,在上届汉学大会上,他主要就孔子学

院对英国汉学的影响做了主题发言,并指出其在英国的建立促进了中国文化在英国的传播与发展。而且,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国际影响力的提高,学习中文的英国人越来越多。在他任教的中文翻译教学班上,主修汉语的就有四十多人,而辅修汉语的也有三十多人,可见一斑。

在本届大会上,司马麟教授将作“1700-2000年英国报刊中孔子形象的演变”的主题发言,并试图从英国大众媒体和读者的视角切入,以报纸为载体,考察三百年来孔子文化在英国的传播史和接受史,进而分析近年来中国对外文化政策、汉学在英国的发展及其影响。他以1699年为时间起点,查阅了近三个世纪以来几乎所有的报刊资料,发现英国各大媒体平均每年会有二十次左右涉及孔子的言论。“以前英国的报纸不是特别关注国外的新闻,没有太多的关于中国文化事件的实事实载,提到孔子的时候,都是对其语录的引用,而这背后的动机,却不是出于对孔子文化的发掘和传播。那么,为什么要引用孔子的话呢?”他饶有兴趣地说道:“因为在英国人眼里,东方的孔子是一个在

为人处世方面很聪明的人,他与西方的苏格拉底这些哲学家不太一样。更有趣的是,在早期的报纸里,很多引用的语录是记者随意编撰以求吸引大众眼球的。那时英国人对孔子尚存误解,但近年来情况出现了变化,通过对比就会发现很多有意思的问题。”

对于本届大会的期待,教授提到了主题为“中国典籍的翻译及其当代意义”的分组会议。“翻译是文化间交流的桥梁,翻译的好坏,会直接影响到文化的传播和接受。关于这个问题已经形成了一门学问,这背后有一整套理论,我现在正在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和教学,所以这次特别想听大家介绍和分享这方面的经验。”

谈及本届大会主题“汉学与世界”,司马麟教授赞赏道:“汉学发展到今天,内涵越来越丰富,文明的对话也越来越频繁,当代中国的发展轨迹对于世界上的其他国家都很有借鉴作用。所以,这个主题是很有意义的,我相信这又将是一次愉快的汉学之旅。”

当记者在机场接口与费乐仁教授初识时,“不好意思,我来迟了,让你们久等了。”一句话便拉近了他与我们的距离。让我们惊讶的是他的行李:一个行李箱,一个大书包,一个手提包,都是满满当当的。对此,费教授微笑着解释道:“这里面装的都是书,在其他地方都忙,参加本届汉学大会,使我能够与很多学者沟通交流,使我的心境得以回归。”言谈之中,他那谦逊的大家风范、勤勉的学者态度,令人印象深刻。在回校的途中,我们进行了轻松而富有意义的交谈。

记者注意到费教授最初的学术领域是美国研究,然而最终转向了比较哲学,甚至涉及宗教学。提起学术道路上的转变,费乐仁解释说原因很复杂,一方面是宗教上的皈依,另一方面他那时的毕业论文是比较马克思、黑格尔和摩门教,这是一个三维的比较,所以他已经对比较哲学及神学的有所思考。1977年前后,费教授曾到菲律宾教授古希腊文、希伯来文等语言,那时正值毛泽东主席逝世,因此他开始有了从政治哲学的角度思考中西哲

学的想法。在交谈过程中记者发现到,“有意思”是费教授的口头禅,这体现了费乐仁教授拥有一种观察世界的着眼点和一种突破惯性的学术研究态度。随后,费教授也向我们介绍了在本届汉学大会上将展示的研究成果和观点,即“英文汉学翻译的新气象”。他谈到,过去主要是对中国古代典籍的翻译,特别是经学典籍,而近十年来,开始出现对典籍注释的翻译。这与他所研究的基督教传教士的翻译有很大的不同。对于这些变化,他也寄望于有更多人重视这个汉学翻译的新现象。

对于跨学科研究的分析方法,费乐仁教授坚定地表示:“我不是按照20世纪以来形成的学科范例和标准,而是坚持多元的方法,这对从前很多人来说是很难做到的,因为这些人想稳定自己在学术界已建立方法论,他们虽然能在一个狭窄的范围内做较深研究,但是缺少某种与生命经验的联结。所以,他们变得聪明而没有智慧,然而唯有智慧才能领悟生命。”在这点上他也提到,自己因为坚持多元

的研究方法而被一些学者视为在做无价值研究,然而他认定那是一条探寻生命智慧之路。

当问起费教授对中国社会的变化有何感想时,他感慨“实在是太多方面的变化”,首先是互联网的普及,使得人民获得了更多自由去认识和探索外部世界;其次,法律上对私人财产的保护也是很大的进步。此外,他还提到了独生子女政策对中国社会结构的深刻影响,从前中国社会以大家庭为社会单元,而现在超过半数的家庭都是小家庭,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变化。最后他说:“我讨论的不是宏观的变化,而是我所看到的普通人的生活改变,对我来说,这是更有意思的。”

谈话接近尾声时,费教授向我们分享了他始终在思考的问题,即“究竟是什么是哲学”“什么是宗教”和“哲学跟宗教的异同在哪里”,作为数十年研究比较哲学和比较神学的资深学者,费乐仁教授一直在用他独特的视角,跨越多个文化语境,来探寻这些哲学层面的终极问题。



# 探寻生命智慧的不倦之路

## ——专访香港浸会大学费乐仁教授

李双南



# 跨文化研究视角中的中国文化

## ——专访德国汉学家梅嘉乐教授

谭菲

11月1日下午,深秋的北京带着些许寒意,本报记者于机场迎接到了来自德国的汉学家梅嘉乐教授,虽然带着些许倦意,她还是欣然接受了采访。

跨文化交流:民族性与世界性

记:请问您这次参加第三届汉学大会准备讨论哪方面的内容?

梅:关于如何改变欧洲汉学的方向,我们现在更加提倡一种跨文化研究的方法。如果一个汉学家从跨文化研究的角度看中国,那么他将不只看到中国文化的特性,还能看到在国际视角下中国文化的地位和影响。上世纪九十年代我曾写过一本关于中国现代派音乐的书,关注的是中国音乐中的民族性。作曲家们总是强调他们是“中国作曲家”,而不是“作曲家”,故在他们看来“中国”很重要。但如果从跨文化角度来看,则只能视他们的音乐为音乐,而不是“中国音乐”。譬如谭盾的音乐中有很多美国、欧洲乃至非洲的元素,但如果仅仅看到其中中国的那部分,就无法充分了解他的音乐。即便是中国的古典文化,其实也是融合了世界很多其他地区的文化,所以从跨文化的角度可以理解中国古典文化的多重方面。中国如今世界化了,和世界其他地方都有一样的东西,但有趣的还是那些不一样的。

记:您对本届汉学大会抱有怎样的期待?

梅:我希望知道中国的汉学家是否认可从跨文化的角度研究汉学、看待中国。譬如我们看中国的音乐,可以侧重于“音乐”,而不以其民族性为主。一些中国学者现在还是接受不了这种跨文化角度,他们觉得中国是一个特别的国家,故一定要看到它的特性。我觉得一个学者,不应总是用一样的方法和角度来进行研究,否则学术研究会很无聊。中国希望能走向世界,所以它应该了解自己的文化有什么世界性,如果只注重民族性,就会显得有些排外,这在一些外国学者看来,甚至有些“可怕”。

记:您为什么会用“可怕”这个词呢?

梅:这和欧洲国家自己的经验有关。两次世界大战爆发的部分原因是民族意识过强,比如德国。假如一民族性很强,就会很自然地“我好,你不好”“不要你的东西,因为我的东西比你的东西好”等话,这就是排外。所以一些很注重民族性的国家,让欧洲的学者感到有点可怕。所以我希望大家能从一个更加世界性的角度来研究,这样或许能帮助了解相互之间的想法和期望。每个国家的强大都需要依靠其他国家的帮助。譬如唐朝之所以文化如此发达,是因为它的文化相当开放,与很多国家进行了交流。中国文学当今之样态,也是跨文化交流的结果。文化要发展,就必须有跨文化的交流。

中国印象:“可怕”的吸引力

记:在您看来,欧洲对中国的主流看法是什么呢?

梅:这个问题很复杂,因为不同的主体对中国的印象都是不一样的。如果从欧洲媒体的角度来看,他们的主要印象有两个方面:首先是中国经济发展很快,非常了不起;另一方面,中国经济的腾飞对欧洲国家潜在的冲击令他们担忧,这就与“可怕”联系起来。媒体是面向大众,传递简单概念的,但是把复杂的東西简单化,那就只能变得片面、偏狭。欧洲媒体对中国的介绍出现简单化、片面化、宣传化的现象,这在每个国家都一样,而真实情况却是复杂的。

记:那您本人对中国的印象是怎么样的呢?

梅:中国历史悠久,要研究中国历史才能理解中国人。我第一次来北京是1987年,如今北京发展很快,很多东西都已经和当年不一样了。发展虽然是好的,但也不一定是进步的,一旦趋同,无差别就不好了。